

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因素及经济后果研究

——基于文献综述视角

周 晟

江西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江西 赣州

收稿日期: 2026年3月9日; 录用日期: 2026年4月2日; 发布日期: 2026年4月14日

摘 要

随着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 数字化转型成为了当前学术界的热门议题。企业作为经济活动的主体, 数字化转型是增强自身实力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文章通过对国内外有关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文献检索, 全面梳理和阐述当前有关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研究概况。首先, 对数字化转型概念进行了分析, 概括其现有研究的相关理论; 其次, 总结了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因素及经济后果; 最后, 基于上述分析提出了启示与展望, 以期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在学术及实践中的深入发展和广泛应用。

关键词

数字化转型, 文献综述, 影响因素, 经济后果

Research on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Enterpris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Based on a Literature Review Perspective

Sheng Zhou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Jiangxi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Ganzhou Jiangxi

Received: March 9, 2026; accepted: April 2, 2026; published: April 14, 2026

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digital transformation has become a prominent topic in current academic research. As the mainstay of economic activity, enterprises regard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s a crucial measure to enhance their competitiveness and achiev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Based on a literature review of enterpris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both in China and abroad, this paper comprehensively sorts out and expounds on the current research landscape in this field. First, it analyzes the concept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nd summarizes relevant theories from existing studies. Second, it reviews and analyzes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enterpris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Finally, it puts forward implications and prospects based on the above analysis, aiming to promote the in-depth development and extensive application of enterpris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n academia and practice.

Keywords

Digital Transformation, Literature Review, Influencing Factor, Economic Consequence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近年来，在信息技术革命浪潮的持续推动下，以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物联网等为代表的数字技术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渗透至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深刻重塑着全球产业格局。我国政府高度重视数字经济的发展，明确强调“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这一要求的提出不仅为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提供了强大的政策驱动力，也给企业的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面对当前席卷全球的数字科技革命和产业结构的深刻变革，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不仅是应对挑战、把握机遇的必然选择，更是流通企业在新形势下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鉴于此，我国企业纷纷积极响应国家战略，积极参与并大力推进数字化转型进程，力求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提升自身的核心竞争力。

企业数字化转型作为当下企业发展的重要战略方向，不仅能够提升企业的效率和竞争力，更能重塑商业模式和驱动持续创新，促进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赵聪慧和范合君(2023)指出，与欧美国家相比，我国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水平较低，这是因为数字化转型需要前沿的技术支撑和资金支持，而现有的数字基础设施、技术配置以及数据要素的供给等还无法满足我国企业的数字化转型需求[1]。为进一步加深我国企业对数字化转型的认知与理解，本文通过梳理数字化转型的相关文献，了解企业数字化转型相关概念及研究现状，并总结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因素及数字化转型带来的经济后果，以期为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学术研究提供参考与借鉴。

2. 数字化转型概念界定及理论基础

(一) 数字化转型的概念

数字化转型是指企业或组织应用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重构价值体系并建立数字化商业模式的过程，其核心是通过数据要素驱动业务优化升级和系统性变革。该转型以构建新型能力体系为核心路径，涵盖数字化供应链、平台生态构建与生产环节深度融合。随着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研究的逐步深入，学者对数字化转型的概念进行了深层剖析。企业数字化转型远非简单的技术应用或自动化升级，而是一场深刻的、涉及企业全方位的系统性变革，企业通过深度融合数字技术，可以驱动企业内外部的创新并实现可持续发展。

当前，国内外学者对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概念并未统一，但是他们对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认知具有

一定的趋同性。Tang 等(2025)将企业数字化转型定义为企业利用数字化技术的进化式进程,旨在通过数字化技术的应用来提升企业的综合实力[2]。Albakri (2024)从商业角度对企业数字化转型进行定义,即数字化转型并不仅仅只是 IT 行业的一个后端过程,更应该是数字化时代背景下企业的战略升级[3]。杨书燕等(2023)也指出,数字化转型是以数字技术为基础,在业务运营、业务流程和价值创造等多方面的一场企业革新[4]。由此可见,目前国内外学者普遍将企业数字化转型解读为一场基于数字化基础的组织变革过程。这些研究为我们理解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了多元视角,本文拟在已有文献的基础上,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因素和经济后果进行梳理总结,并提出未来研究展望。

(二) 相关理论基础

1) 组织变革理论

组织变革理论最早由 Lewin 于 1947 年提出,他认为,企业需要根据内外部环境的变化,及时调整、改进和革新组织中的各种要素,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市场需求和技术发展的过程。Zhu 和 Zhang (2024)指出,组织变革理论中的“三阶段模型”是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核心逻辑,数字化时代背景下,企业需要及时作出调整,引入数字化技术,实现全领域的数字化变革。面对外部环境的变化,企业需要保持清晰的战略方向和灵活的执行策略,不断调整和优化组织结构,以实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5]。

2) 流程再造理论

流程再造这一概念最早由 Champy 和 Hammer 提出,是指企业通过优化设计业务流程,实现成本、服务、质量、效率等方面的改善。流程重构的关键思想是彻底重新设计业务流程,而不仅仅是简单地应用新技术或是按照旧模式进行小修小补。周佳卉等(2025)通过研究发现,在数字化时代背景下,企业要借助数字化技术全面优化现有业务流程,通过新的理念、理论和技术结合,让客户喜欢这些产品[6]。如果企业仍采用传统的业务操作方式进行根本的改革和重建,则难以突破过时的管理和组织结构限制。而系统的改革流程能够显著提升服务和产品的质量,使企业能更快地响应市场和顾客需求,提高效率 and 绩效。

3) 权变理论

1962 年, Fiedler 首次提出权变理论的概念,强调企业在注重内部管理调整的同时,也需要关注企业外部环境的改变。外部环境的变化对于企业发展而言能够起到导向作用,因此企业须兼顾内部管理与外部环境监测。数字化技术带来的巨大冲击,对企业来说既是挑战,也是机会。Yu 等(2025)指出,企业应持续关注外部经营环境的变化,借助数字技术,全面细致评估自身经营状况,制定合适的数字化战略和转型路径[7]。

3. 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因素

(一) 宏观政策

基于权变理论,企业在自身发展的同时需要时刻注意外界环境的改变。政府政策作为一种关键的资源配置工具,能够在宏观层面上对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带来深远的影响。宏观政策的导向是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核心驱动力,它通过顶层设计明确转型方向,利用资源倾斜降低转型成本,显著助推企业数字化能力的提升。李九斤和徐妍妍(2022)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各国政府将数字化转型纳入国家战略,通过财政补贴、税收优惠等宏观政策极大程度地激励企业的数字化转型[8]。黄一松(2023)以 2008~2020 年中国 A 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税收优惠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税收优惠能够减轻企业一定程度上的税收负担,缓解了企业的融资约束[9]。李海艳等(2025)采用双重差分法探究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这一税收政策是否会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从财力资源、非物力资源和人力资源视角进行机制分析发现,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通过增加企业的盈利能力、数字化技术无形资产和技术人员

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10]。此外,政府的参与意愿和政策导向对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有着重要的影响。李睿等(2025)研究发现,政府通过设立专项资金和提供补贴,直接减轻企业购置云服务、工业软件和智能设备的初始投入负担,这对资金有限的中小企业尤为关键[11]。由此可见,宏观政策对于企业数字化转型带来了巨大的影响,无论是通过税收优惠、财政补贴等直接纾解企业资金压力,还是依托国家战略引导转型方向,都能从融资约束、资源投入、人才技术等多个维度为企业破除转型障碍,为不同规模企业的数字化升级提供坚实支撑与持续动力。

(二) 市场竞争

随着市场竞争逐渐加剧,企业面临成本压力剧增、需求波动加剧等严峻挑战。曾皓(2024)以 2014~2018 年 A 股非金融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运用准自然实验的方法研究了市场竞争机制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及其作用渠道,并证实了市场竞争机制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正向促进作用[12]。但是,市场竞争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并非只呈现出正向关系,韩超和郭庆(2024)基于熊彼特假说视角,利用 2011~2022 年我国沪深 A 股上市公司数据研究发现,企业规模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具有非线性促进作用,且边际效应递减;市场竞争和企业数字化转型之间呈“倒 U 型”关系,即在某一市场竞争程度下,企业数字化转型意愿达到峰值,超过这一阈值,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意愿逐渐降低[13]。胡平波等(2025)聚焦企业数字化转型同群效应,构建数理模型分析其内在差异性[14]。市场竞争对不同类型的企业所带来的影响是截然不同的,成长型企业数字化表现出较强的正向信息传递效应,而成熟型企业则呈现出更为显著的负向市场竞争效应;技术先进企业更善于吸收同群企业知识,从而加速自身数字化转型。Nguyen 等(2025)通过对中国的上市公司年报中的产品和服务描述分析发现,在更多数字专利发明的推动下,市场竞争的加剧增加了数字化转型的可能性,异质性分析表明,这种影响在非国有企业和市场化环境更强的公司中更为明显[15]。

(三) 管理者特征

管理者的核心特征涵盖性别、任职期限以及教育水平等方面,管理者的决策往往会受到其个人背景与认知结构的深刻影响,故而也会影响到企业数字化转型进程。企业数字化转型离不开人才的支撑,高管团队作为企业的核心人力资本,主导企业的战略制定以及资源配置,会影响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决策。张克群和江昱坤(2024)研究发现,具有信息技术背景的高管会减少短视行为的概率,相比没有信息技术背景的高管而言,他们更倾向于采取企业数字化转型这一长期战略,这进一步验证了管理者特征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重要影响[16]。Jin 等(2023)以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得出了相似的结论:高层管理者的技术背景对企业数字化转型战略的选择起到了增强的作用,社会资本对企业数字化转型起到削弱的作用[17]。张梓萌等(2023)考察发现,管理者的海外经历能够显著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且海外留学经历所带来的促进作用更大[18]。毛聚等(2022)基于沪深 A 股上市公司数据,发现 CEO 复合职能背景显著提升了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且能提升公司价值[19]。苏宗伟等(2025)以 2006~2020 年沪深 A 股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 CEO 调节焦点对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以及企业产权性质和行业竞争程度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CEO 促进型焦点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 CEO 防御型焦点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20]。综上所述,现有文献从管理者的技术背景、海外经历、复合职能背景乃至调节焦点等多个维度展开探究,均一致证实管理者个体特质与背景特征会通过塑造其认知偏好、决策逻辑与战略选择,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方向、力度与成效产生显著且差异化的影响,充分凸显了高层管理者在企业数字化转型进程中的关键作用。

(四) 企业内部资源

企业的内部资源是企业实现战略目标的基础,企业在运营过程中积累、创造并拥有的涵盖数据、技术、系统、人才、流程等多个维度的资源,都是企业在实现数字化转型的核心支撑。曾江洪等(2024)基于客户资源集中度视角,以 2007~2021 年中国 A 股非金融类上市企业相关有效数据,运用动态非线性效应

面板模型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进程中伴随客户资源集中度的变化,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客户资源配置的非线性关联呈U型,即当企业处于数字化转型的初始阶段时,通过信息搜集优势拓展客户资源以实现分散配置客户资源的迹象明显,而伴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深化,便开始步入通过筛选客户资源和整合客户资源以推动客户资源集中配置的轨道[21]。马鸿佳(2025)收集407家中小制造企业数据,运用层级回归法验证数字平台能力对数字化转型绩效的影响机理。研究发现:数字平台能力对数字化转型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企业基于原先的资源投入可以更快地启动新的数字化项目,利用已有的数据、用户和流程基础,更快地看到转型成效,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转型的风险[22]。张敏和李博(2023)基于小微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实践探索,在借助应用程序、组件产品、媒体内容和信息基础设施推进数字资源拼凑的同时,实施有效的IT治理,能够帮助小微企业提升IT二元能力并推动开放式创新。然而,企业内部资源的匮乏,亦将成为制约企业数字化转型深入拓展的关键因素[23]。Wang和Sun(2024)选取2008~2022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表明,我国金融资源错配显著抑制了我国企业数字化转型,且经过一系列内生性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24]。综合现有研究可见,企业内部的数据、技术、人才、平台等资源禀赋,既为数字化转型提供核心动能与效率支撑,也会通过客户资源配置、数字平台建设、资源拼凑与IT治理等路径影响转型成效,而内部资源不足与金融资源错配等问题,则会直接形成阻碍。

4. 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经济后果分析

(一) 提升绿色创新水平

基于组织变革理论,数字化转型核心在于数字化技术赋能企业,从根本上改变了创新流程、资源配置和商业模式,从而为绿色创新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可能性。李梅等(2025)以2007~2023年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是全方位要素同数字技术的深度融合,助力企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转型过程,数字化的管理模式为绿色创新创造良好环境,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绿色创新水平,并且这一结论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和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25]。李宁娟和杨卓尔(2025)从环境不确定性视角构建理论模型,研究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影响绿色创新的深层机制,实证研究表明,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绿色创新数量和绿色创新质量均有促进作用,数字化转型有利于降低企业面临的环境不确定性[26]。苏涛永和郭鑫(2025)以2007~2021年中国A股上市工业企业为样本进行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通过提高信息透明度和风险承担意愿促进企业绿色创新持续性,不仅提高了绿色创新水平,对企业绿色创新持续性也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对处于高环境规制强度的企业、国有企业和高管者过度自信的企业绿色创新持续性的促进效应更强[27]。师博和常青(2024)将数字化转型分解为技术驱动与应用驱动,来更好地挖掘企业数字化转型赋能绿色创新的效果和机制,结果显示,应用驱动数字化转型仅能提升企业绿色创新质量,而技术驱动数字化转型赋能绿色创新具有“量质齐升”的效果,并且后者对绿色创新质量的作用更加明显[28]。

(二) 改善资源配置

资源配置是企业对所拥有或可掌控的人力、物力、财力、技术、信息等各类资源进行合理分配与优化组合的过程,其对企业的生存与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基于流程再造理论,数字化转型带来了业务流程的重构,通过数据互通、系统协同与流程自动化实现资源要素的快速调度与精准匹配,有效减少了资源闲置、重复投入与配置错位现象。傅元海和熊豪(2024)指出,在数字技术加持下,以数据成为关键生产要素为逻辑起点,数字化转型推动要素数字化、重塑组织结构与分工模式、催生“平台+企业”新型竞争模式,促进资源高效流动,数字化转型驱动资源配置突破微观企业边界和宏观时空限制,拓宽资源配置范围[29]。郑玉(2025)等采用2011~202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通过中介效应模型分析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优化配置金融、人才、技术三类资源正向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30]。戴翔等

(2024)的研究表明,数字化转型会同时产生竞争强化效应和创新垄断效应,前者有利于推动实现资源优化配置,而后者则具有反向作用,如果企业能够推动生产要素自由有序流动,可以实现资源优化配置[31]。李杰等(2023)基于2011~2020年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使用文本分析方法刻画企业数字化转型强度,应用双重机器学习模型实证证实了企业数字化转型整体上显著提升了劳动资源配置效率[32]。吕可夫等(2023)以2007~2019年沪深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数字化转型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得到了相似的结论:数字化转型是一种重要的价值创造方式,能够显著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并且该结果在经过工具变量法、倾向得分匹配、替换变量等检验后依然保持稳健[33]。

(三) 缓解融资约束

融资约束是企业融资的重大难题之一,现有的实证研究已经证明企业数字化转型显著降低企业融资约束水平,对我国化解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推动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赵家悦和卢锐(2024)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降低了企业的信息不对称程度和信贷违约风险,从而有助于降低信贷融资成本[34]。定量分析表明,企业每增加一千万数字化投入所带来的变化,将使其信贷融资成本在平均意义上降低大约0.3个百分点,长期信贷获取能力和商业信用融资能力两方面进一步揭示了数字化转型的融资价值。许林等(2023)以我国沪深A股2398家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分析数字化转型、创新活力及二者的交互效应对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发现数字化转型和创新活力的提升能够显著缓解企业融资约束[35]。曾富全和李泓安(2024)以2013~2021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融资约束削弱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并且数字化转型在非国有企业中对企业发展质量的提高效果更好,东部地区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对其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更强[36]。李健等(2023)基于商业信用融资视角,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有助于企业获得更多的商业信用融资,且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商业信用融资获取的促进作用在高科技行业、高战略差异度、成熟期和低管理层持股比例的企业中更显著,企业的数字化转型能够提高融资效率[37]。

(四) 降低股价崩盘风险

股票市场通常被视为经济的晴雨表,其股价变动不仅跟随经济周期波动,还具备预测经济周期变化的能力。在复杂的资本市场中,股价崩盘极易导致“羊群行为”的发生。Liang和Zhao(2024)取2013~202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样本,考察了企业数字化转型降低股价崩盘风险的机制,证实企业数字化转型显著改善内部治理,从而降低股价暴跌风险;企业数字化转型显著提高了分析师的关注度,从而降低了股价暴跌的风险[38]。Wu等(2022)以2007~2020年中国上市公司为样本,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可以显著降低股价崩盘风险,并表现出一定的结构性异质性,且数字化转型带来的降低股价崩盘风险的效果在高新技术企业和经济发达地区更为明显[39]。Liu等(2024)以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能显著提高股票流动性,进而降低了股价崩盘风险并提高分析师预测准确性。根据信息不对称理论,市场交易中的双方对信息的掌握程度存在差异,掌握信息更多的一方可能利用这种优势谋取利益,从而影响市场的效率和公平,而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通过缓解信息不对称、改善企业基本面来抑制股价崩盘风险[40]。于成永等(2024)构建了数字化转型影响股价崩盘风险的理论框架,以2014~2021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为样本,实证检验发现,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会导致股价崩盘风险下降,由于企业产权性质、创新效率、财务报告质量、产业属性和市场化程度不同,数字化转型对股价崩盘风险影响程度也不同[41]。

通过对现有文献梳理可以发现,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经济后果的影响是多维度的。企业数字化转型不仅提高企业的绿色创新水平和改善企业的资源配置,也对融资约束、股价崩盘风险起到了缓解和降低的作用。鉴于不同企业及行业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面临的具体情境和挑战各不相同,未来研究需要深入探索如何根据实际情况有效实施和优化转型策略,并进一步量化与评估这些策略对企业经济后果的全面影响。

5. 启示与展望

通过对企业数字化转型文献的深入分析与总结,本文综述发现,尽管大部分学者认为数字化转型能够为企业带来正向的经济效应,但是仍有少部分学者认为经济效益的提升与数字化转型无关,甚至可能产生负向效应。此外,目前有关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研究多为短期的、局部的或特定领域的研究,缺乏长期和全面的视角,数字化转型研究难以全面反映企业在数字化浪潮中的动态演进过程。多数研究聚焦于转型初期引入技术系统后的短期绩效提升,但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后组织能力重构、商业模式颠覆等长期效应缺乏追踪。基于这一发现,针对现有企业数字化转型研究的不足及未来发展趋势,提出以下启示:

第一,构建统一的数字化转型理论框架,深入探索数字化转型更深层面的应用。由于缺乏明确的概念与认知框架,企业界与学术界对于数字化转型的讨论往往停留在技术应用层面,或陷入“盲人摸象”般的局部争论。这种认知上的模糊与分歧,直接导致了战略规划缺乏共识基础、资源配置失当以及转型成效难以衡量的困境。因此,构建一个统一的理论框架,其紧迫性不言而喻。

第二,随着数字化技术的发展,数字化转型已成为企业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势,更应当注重数字化转型的实践过程,探索新的评估方法和工具,对不同行业的数字化转型实践进行对比剖析,构建涵盖技术成熟度、组织敏捷度、数据资产价值、客户体验优化度等多维度的评估体系。同时,还需要加强企业之间对数字化转型的普及和宣传,通过搭建行业交流平台、举办数字化转型案例分享会,让成功经验得以复制推广。

第三,完善研究主体和内容体系,深化案例研究,加大对中小企业、新兴经济体的案例研究。对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相关研究不能仅仅停留于实证层面,更需要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后的长期效应进行追踪。这也为未来对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方向:重点考察数字化转型在企业战略、市场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带来的长期影响,可以通过建立长期观测点、开展跨期对比研究、运用纵向数据分析等方法,持续追踪企业数字化转型后三至五年甚至更长时间的经济后果,从而更精准地揭示数字化转型的长期价值,为理论构建与实践指导提供坚实依据。

参考文献

- [1] 赵聪慧, 范合君. 企业数字化转型评价体系构建、进程测度与提升路径[J]. 财会通讯, 2023(6): 9-17.
- [2] Tang, Y., Sun, J., Liu, X. and Hu, Y. (2025)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nnovation and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in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Finance Research Letters*, **80**, Article ID: 107298. <https://doi.org/10.1016/j.frl.2025.107298>
- [3] Albakri, M. (2024) Perspectives on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n Contemporary Business. IGI Global.
- [4] 杨书燕, 宋铁波, 吴小节. 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制度动因及过程[J]. 科研管理, 2023, 44(9): 39-46.
- [5] Zhu, X. and Zhang, H. (2024) Research on Organizational Change of Enterprise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cademic Journal of Business & Management*, **6**, 10-14.
- [6] 周佳卉, 尹志荣, 李超. 调查队系统统计执法检查与数据质量核查一体推进路径研究——基于流程再造和 DeepSeek R1 构造“小统 AI”的探索[J]. 统计与管理, 2025, 40(4): 4-14.
- [7] Yu, F., Gao, X., Li, X. and Jiang, D. (2025) Digitalization Policy and Enterpris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The Role of Big Data Capability. *Economic Analysis and Policy*, **86**, 2095-2113. <https://doi.org/10.1016/j.eap.2025.05.049>
- [8] 李九斤, 徐妍妍. 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探究[J]. 财会月刊, 2022(11): 39-45.
- [9] 黄一松. 税收优惠能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吗[J]. 当代财经, 2023(12): 144-156.
- [10] 李海艳, 周泳宏, 殷培焱. 税收政策如何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基于多资源视角的机制分析[J]. 产经评论, 2025, 16(2): 81-99.
- [11] 李睿, 张露平, 王欢. 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数字化转型: 理论与实证分析[J]. 管理科学学报, 2025, 28(2): 31-49.
- [12] 曾皓. 市场竞争机制促进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吗?——基于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的准自然实验[J]. 外国经济与管理, 2024, 46(3): 136-152.

- [13] 韩超, 郭庆. 企业规模、市场竞争与企业数字化转型——熊彼特假说的再考察[J]. 工业技术经济, 2024, 43(7): 33-41.
- [14] 胡平波, 彭修远, 宁亮. 企业数字化转型同群效应下市场竞争与信息传递效应研究[J]. 软科学, 2025, 39(11): 98-104.
- [15] Nguyen, T., Song, G., Zhao, S. and Zuo, C. (2025) Market Competition and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n Firms. *Finance Research Letters*, **73**, Article ID: 106684. <https://doi.org/10.1016/j.frl.2024.106684>
- [16] 张克群, 江昱坤. 管理者特征、动态能力与企业数字化转型: 基于 PLS-SEM 模型[J]. 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 2024, 44(11): 3481-3500.
- [17] Jin, Y., Xu, H. and Su, X. (2023) Digital Transformation, Dynamic Capabilities and Enterprise Innovation Performance Based on Dynamic Capability Theory and Upper Echelon Theory. In: *Frontiers i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Applications*, IOS Press, 276-288. <https://doi.org/10.3233/faia230739>
- [18] 张梓萌, 胡秀深. 高管海外经历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实证研究[J]. 商业观察, 2023, 9(26): 53-57.
- [19] 毛聚, 李杰, 张博文. CEO 复合职能背景与企业数字化转型[J]. 现代财经(天津财经大学学报), 2022, 42(9): 37-58.
- [20] 苏宗伟, 周豫汝, 曹春辉. CEO 调节焦点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研究[J]. 软科学, 2025, 39(4): 44-52.
- [21] 曾江洪, 柳煜涵, 黄向荣.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客户资源配置非线性关联探讨[J]. 中央财经大学学报, 2024(8): 117-128.
- [22] 马鸿佳, 王春蕾, 陈欣. 数字平台能力对中小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绩效的影响研究[J]. 管理学报, 2025, 22(7): 1227-1235.
- [23] 张敏, 李博. 数字资源拼凑如何推动数字化转型?——基于小微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实践探索[J]. 财贸研究, 2023, 34(10): 85-98.
- [24] Wang, J. and Sun, L. (2024) A Study of the Impact of Financial Resource Mismatches on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Enterpris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 **16**, 1. <https://doi.org/10.5539/ijef.v16n12p1>
- [25] 李梅, 侯力, 李婧. 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 理论机制与政策启示[J]. 商业研究, 2025(5): 1-12.
- [26] 李宁娟, 杨卓尔. 从数字化转型到绿色创新——环境不确定性的因果中介效应研究[J/OL]. 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 1-26. <https://doi.org/10.20201/j.cnki.ssstm.20250826.001>, 2025-09-18.
- [27] 苏涛永, 郭鑫. 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绿色创新持续性的影响研究[J]. 经济体制改革, 2025(3): 136-145.
- [28] 师傅, 常青. 企业数字化转型赋能绿色创新的效果与机制研究[J]. 经济管理, 2024, 46(11): 67-88.
- [29] 傅元海, 熊豪. 数字化转型改善资源配置的理论逻辑与路径选择[J]. 经济学家, 2024(9): 74-86.
- [30] 郑玉, 蔡艳艳, 刘瀑. 数字化转型、资源配置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J]. 统计与决策, 2025, 41(10): 30-35.
- [31] 戴翔, 马皓巍, 金磊. 数字化转型与资源优化配置——兼论对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可能作用[J].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2024, 38(1): 72-85.
- [32] 李杰, 沈宏亮, 宋思萌. 数字化转型提高了企业劳动资源配置效率吗? [J]. 现代财经(天津财经大学学报), 2023, 43(9): 108-125.
- [33] 吕可夫, 于明洋, 阮永平.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资源配置效率[J]. 科研管理, 2023, 44(8): 11-20.
- [34] 赵家悦, 卢锐. 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融资价值: 基于数字化转型的新度量[J]. 会计研究, 2024(6): 55-69.
- [35] 许林, 唐璐, 徐玉发. 数字化转型、创新活力对企业融资约束的缓释效应[J]. 南方金融, 2023(11): 3-18.
- [36] 曾富全, 李泓安. 数字化转型、融资约束与企业高质量发展[J]. 会计之友, 2024(14): 50-58.
- [37] 李健, 李俊豪, 李晏墅. 数字化转型能破解企业融资约束吗?——商业信用融资视角[J]. 现代财经(天津财经大学学报), 2023, 43(7): 21-37.
- [38] Liang, Z.T. and Zhao, Y.Y. (2024) Enterpris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nd Stock Price Crash Risk. *Finance Research Letters*, **59**, Article ID: 104802.
- [39] Wu, K., Fu, Y. and Kong, D. (2022) Does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Enterprises Affect Stock Price Crash Risk? *Finance Research Letters*, **48**, Article ID: 102888. <https://doi.org/10.1016/j.frl.2022.102888>
- [40] Liu, H., Zhu, J. and Cheng, H. (2024) Enterprise Digital Transformation's Impact on Stock Liquidity: A Corporate Governance Perspective. *PLOS ONE*, **19**, e0293818. <https://doi.org/10.1371/journal.pone.0293818>
- [41] 于成永, 马晓慧, 于方舟. 企业数字化与股价崩盘风险: 抑制还是促进?[J]. 会计之友, 2024(5): 20-28.